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机制

冯月季

摘要: 视觉符号修辞主张图像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能够建构现代社会的意义框架。图像化时代,视觉符号修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意义生产和表达机制,通过视觉符号修辞的转喻、提喻和隐喻机制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图像或影像。数字媒介技术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表意机制呈现出了多元共创、动态生成和具身交互特征。跨媒介叙事策略通过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再生产,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现代转译策略有助于生成创新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和表意机制,沉浸式和共情化的视觉符号修辞策略能够有效激发全国各族群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图像;视觉符号修辞;意义;数字媒介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1-0169-08

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已进入图像化时代。图像和视觉符号成为人们创造和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图像化、视觉化的思维成为人们理解、解释和再现世界的重要认知方式。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角度来说,利用图像进行视觉符号修辞是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凝聚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策略。从图像和视觉修辞的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

从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其一,关于视觉修辞的基础理论探讨,系统阐释了视觉修辞的学术范式、核心概念和理论维度^[1],并在此基础上对视觉修辞理论框架内的具体问题展开研究,如视觉修辞视野下的语图关系^[2];其二,以视觉修辞为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制和实践策略,通过图像表征等语法如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图像化^[3];其三,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修辞实践策略的个案研究^[4]。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修辞机制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和思考路径,在概念阐释、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不过,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依托的是传统图像学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动视觉修辞理论体系的深化和延展。

基于此,本文结合视觉修辞与符号学理论,提出视觉符号修辞的概念,以此为理论基础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符号修辞的意义框架建构,并分析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范式转换及其实践路径。

收稿日期: 2025-07-09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项目“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建构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研究”(2020-GMB-002);汕头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国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机制研究”(STF23006);汕头大学东南亚华侨文化与语言战略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东南亚华裔新生代潮汕文化符号记忆与认同机制研究”(2024WXY DNY-RP02)。

作者简介: 冯月季,男,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汕头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研究员,汕头大学东南亚华侨文化与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汕头 561000)。

一、以视觉符号修辞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框架

图像转向为当今视觉符号修辞学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技术逻辑和文化动因,人们越来越关注图像符号建构社会文化意义框架的重要性。视觉符号修辞使得抽象的观念和具象的图像之间呈现出一种自然化的关联,为人们理解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意义机制。

(一)理论演进:视觉符号修辞的兴起及内涵

视觉符号修辞是在新修辞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修辞范式。新修辞学兴起之前,传统修辞学关注的是语言的修辞逻辑和效果。它重视通过界定概念、类比推理、谋篇布局等修辞方式组织语言材料,形成具有严密推导关系的文本结构,通过逻辑推理达到说服的目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学将修辞的范畴从语言扩展到人类的整个符号系统,伯克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在符号系统中展开的象征实践,以照片、电影、漫画、新闻图片等为代表的图像符号系统构成了人类重要的象征实践维度,一种超越传统语言符号修辞的视觉符号修辞正式登场亮相。

视觉符号修辞的兴起得益于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推动。从理论层面说,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将视觉和图像作为研究问题的中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现代世界是一种图像化存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通过批判笛卡尔哲学的“我思”问题,将视觉推向了本体存在的位置。沿着这一进路,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约翰·伯格(John Berger)等人从更为细微的视角探讨了图像和视觉修辞的运作系统和表意机制。推动视觉符号修辞兴起的另外一重理论动力来自符号学,符号学研究的是人类创造符号并使用符号表达意义的问题,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总体的文化现象,远远超出了传统修辞学局限的语言学领域。尤其是随着当今人类文化进入图像时代,影视、游戏、广告、设计等视觉文本成为人们表达意义的重要媒介,探讨这些视觉媒介文本符号的表意功能,必然也会涉及文本修辞的问题,这就要求修辞学理论必须从语言领域扩展到多种媒介形态,符号修辞学恰恰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

从实践层面看,视觉符号修辞的兴起是技术、社会文化与政治层面等多重因素交织驱动的结果。从技术动因来看,人类的媒介环境发生了从文字主导到视觉主导的转向,随着数字媒介的快速发展,短视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推动着图像符号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这必然催生对视觉符号修辞的系统性运用。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社会节奏加快使得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发生变化,现代人更倾向于快速、直观、情感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视觉符号比文字更符合这种需求,图像和视觉符号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建构意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政治层面来看,视觉政治在图像化时代成为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视觉政治的表达机制旨在探讨当代视觉表征模式与感性传达之间的政治性关联”^[5]。政治传播越来越依赖图像化、视觉化的符号叙事来简化复杂议题、激发情感共鸣,视觉符号修辞能够将抽象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可感知、可记忆的意象,政治和社会治理通过视觉符号修辞实现的可视化、情感化,则能够有效提升传播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

视觉符号修辞并非简单的“用图像说话”。与传统的语言符号修辞相比,视觉符号修辞是通过图像和视觉符号的系统性编码与策略性组合,以影响受众认知、态度、情感乃至行为的表意实践。因此,视觉符号修辞强调视觉形式本身,图像、色彩、影像、构图等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直接触发感知、建构意义、唤起情感、形成价值认同的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视觉符号修辞作为当今视觉理论转向与符号学的结合体就显得正当其时,其探讨的核心问题在于,图像作为一种独立的符号系统,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运作逻辑建构现代社会的意义框架的。

从符号表意机制来看,视觉符号修辞的意义框架建构遵循特定的运作逻辑,包括从信息传播层面的视觉符号编码策略到意义生成层面的情感唤起、身份确认,最终实现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层面的认同,将特定的价值观、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表征为一种自然化的视觉符号形式。根据这一逻辑,视觉符号修辞就是通过特定的修辞机制实现符号意义、观念、情感的图像化表达。

(二)理论逻辑:视觉符号修辞何以有助于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视觉符号文本的内容构成并非只是图像,大多数情况下,视觉符号文本也是多模态符号文本,文字和声音等符号也参与意义的建构,只不过在视觉符号修辞的意义框架下,它们从属于图像符号的表意

体系。况且,文字符号本身也是一种视觉形象;声音虽然属于听觉,但最终会诉诸一种感官性的形象,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音响形象“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声音,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的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音响形象是感官性的”^[6]。视觉符号修辞中,符号的意义建构和阐释是关键,符号的表意具有普遍性,人们之所以使用符号指代某物,首先是基于一种意义契约,即在一个共同的群体中,符号对于共同体成员具有共享的意义。符号是共同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共同体成员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也形成了共享的价值和信念,并且通过使用符号交流保存和延续了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图像符号是表达和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人的思维活动首先是从感性直观层面的视觉认知开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通过具象化的符号形式才容易被人们把握和理解,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依据特定的修辞逻辑建构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视觉符号修辞理论视域下,图像文本作为视觉符号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精神、意义内涵和价值体系,而且通过视觉符号修辞策略延展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表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根本,为此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种深层次观念、思想和意识的集合体,其文化内涵需要通过形象直观的视觉符号形式来呈现,也就是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符号化认知。在此逻辑之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7],就是对于视觉符号修辞的话语表达,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需要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层面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更强调通过文化认同、历史记忆和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归属感和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视觉符号修辞机制可以通过图像符号的意义建构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提炼和展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从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视觉符号修辞机制具有符号整合功能,可以建构多模态的图像文本。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语境下,视觉符号承载

着重要的政治传播功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迫切需要视觉化的创新策略,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寻找接地气、润人心的传播路径,视觉符号修辞为此提供了有益和可实践的理论基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其理论逻辑旨在阐释如何通过策略性的视觉符号编码与传播,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转化为视觉上可感知、情感上可共鸣、观念上可内化的民族集体认同,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成为每一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生活、审美经验与情感结构中增强身份认同的意义根基。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视觉符号修辞的建构框架

视觉符号修辞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文化的意义框架建构,从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机制,本质上就是要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抽象观念在视觉符号传播层面的呈现方式和修辞策略,探讨其背后的文化符号和意义生成机制。通过视觉符号修辞准确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价值内涵,凝聚各族人民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就要提炼和展示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文化符号体系,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义框架的视觉符号修辞转喻、提喻和隐喻机制。

(一) 视觉符号转喻修辞:基于邻接关联的映射性揭示

视觉符号修辞有着内在的运作机制,其意义框架建构首先是从转喻层面开始的。转喻作为修辞中一种常见的手法,一般是指两个事物之间在空间、时间、因果或逻辑方面具有直接关联性。转喻的生成,是基于同一个认知域中两个认知范畴之间的映射,例如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北京”就指代中国政府。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约翰逊(Mark Johnson)指出,转喻植根于人类的生活经验,“转喻概念的经验基础要比隐喻更明显,它总是有直接的物理联系或者因果关系”^[8]。概括来说,转喻修辞在两个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性的逻辑是通过邻接性发生的。邻接性是指两个事物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某种紧密的、实际的相关性,它们处于同一个认知框架、场景或因果链中。转喻植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经验,因此,邻接

性并非指在两个不相关的事物间创造联系,而是将已经存在于人们认知和现实中的这种联系揭示出来,并强化其意义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视觉符号转喻修辞就是将某种图像符号和抽象观念既存的关系表征出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形态,为了将这种抽象观念以具象化的方式传播出去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同,就需要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寻找恰当的视觉符号,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表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转喻修辞,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或事件与文化身份之间的邻接性来指代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交融性。例如,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宣传画或影像中,以各民族盛装并列转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五十六个民族代表身着本民族服饰站在一起,这种强烈的视觉画面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多元但政治一体的完美转喻。民族服饰的个体差异与空间排列的并置,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视觉表征。

视觉符号转喻修辞还常常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图像或影像作品通过叙述中华各民族前赴后继、英勇抗争的故事,深刻揭示生死与共、休戚与共、命运与共、荣辱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内涵。这类图像或影像作品通过视觉符号转喻修辞唤起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回溯历史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根基,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自然化。

视觉符号转喻修辞绕过理性的、说教式的论证,直接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编码到可亲可感、易于传播的视觉形象中。通过媒介传播与意义关联,表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图像符号最终内化为一种视觉本能,当它们以视觉化的符号呈现时,共同体成员心中便会自动唤起那份关于“我们是谁”的深刻情感与价值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视觉符号转喻修辞通过精心选择和强化这种邻接性,从而在人们心中建构出一种不言而喻、本就如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

(二)视觉符号提喻修辞:基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表征性揭示

与转喻强调邻接性不同,提喻的核心在于部分与整体的表征性关系。如果说转喻修辞使得认知对象变得具体、生动、直观,提喻则有助于人们思维的延展。也就是说,通过提喻修辞实现的认知域扩大

或缩小,能够使得认知主体对认识对象产生更全面、更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将视觉符号提喻修辞应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其意义建构的框架在于:通过最具概括性、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部分”,来激发对“整体”的直接感知与认同。

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为视觉符号提喻修辞提供了意义建构的媒介动因。在媒介化时代,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把握是视觉化和图像化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内容生产的视角来审视空间的价值——它能否变成吸引人的照片和视频,人们也会越来越多地透过手机的取景框来看现实空间”^[9]。人们在媒介化时代对现实空间的理解就是提喻式的;而图像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提喻,“因为任何图像都只能给出对象的一部分”^[10]。视觉符号提喻修辞通过对“部分”的强调意指对象的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一体”,这种“一体性”又建立在对多元化的“部分”表达基础之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提喻修辞,主要是通过仪式化的符号展演或日常化的符号嵌入来强化身份认同,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其一,通过仪式符号进行的文化展演,就是以一种容易辨识的方式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浓缩化再现。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构成仪式过程的最小单元是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就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提喻符号,因为“社会关系是无形的、抽象的,但当人们通过仪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采用一系列象征符号和一系列象征性行为,并通过戏剧化这一形式,可以达到对社会关系的理解”^[11]。例如在国庆升旗仪式中,国旗在日出时分、万众瞩目下冉冉升起的影像,就是“国旗—国家”符号提喻的神圣化展演,能够瞬间唤起民众对国家的敬畏与忠诚。

其二,通过日常化的符号嵌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意识。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在本质上都是实践性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2]。中华文化符号的孕育和产生具有深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劳动生产、社会交往、文化审美等方式与文化符号产生密切的关联,在实践中加深对文化符号意义的理解,从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之场”。我们使用的汉字、图像或影像中的长城、公共场所悬挂的国旗、历史叙事中的名人形象等符号,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视觉背

景”,这些高度凝练、情感充沛的符号提喻修辞,在人们的反复接触和使用中逐渐变得自然化,从而在人们的认知和情感中成为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象的浓缩。

(三)视觉符号隐喻修辞:从具象到抽象的跨域映射

修辞学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有言:“文化的性质大部分是隐喻的性质,隐喻是由文化创造和维持的。”^[13]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了隐喻思维的经验性和跨域映射的特征:通过我们的身体经验,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域发生了关联,从而产生了隐喻的跨域映射。隐喻主要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而概念是人们对经验世界的抽象化的符号表达。隐喻的抽象思维与具象化的图像符号形成一种跨域映射,从而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形成某种特定的价值或观念,正如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所言:“视觉修辞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图示化的方式实现图像符号与某种价值认同之间的深层联结。”^[14]

视觉符号隐喻修辞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创造性与感染力的认知转换形式。它通过发掘并建构两个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感知相似性,将抽象、复杂的共同体观念转化为可直观感知、能引发情感共鸣的视觉符号,从而在心理和想象层面塑造深度的文化认同。根据源喻的不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隐喻修辞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自然—生态隐喻,通过自然界中植物、江河、山川等生态系统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性、共生性和生命力。如今,一个能典型地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文化符号隐喻就是红石榴。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红石榴因其果实饱满、石榴籽紧密抱在一起等特点,而被赋予了民族团结的象征含义。

二是身体—血缘隐喻,通过人的身体部位、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等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亲缘性、一体性和情感性。例如民族团结宣传影像中聚焦身体局部特写,通过紧握的双手或喜悦的面庞传递民族团结的力量与温度,深刻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家庭本色。

三是建筑—空间隐喻,通过房屋、家园、古迹等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性、包容性和秩序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5]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文化符号空间,

以视觉形式呈现的长城、故宫等各种历史建筑遗迹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是旅程—道路隐喻,通过道路、征程、航行等映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性、目标感和互助性。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自2007年开始举办大型主题展览《复兴之路》,讲述了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通过大量珍贵文物和照片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辱、奋发图强,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被唤醒,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得到了深化。

三、数字媒介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符号修辞的范式转换

从符号表意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介时代的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意义由作者主导,受众在接收视觉符号修辞文本意义的过程中缺乏互动性和创造性。在数字媒介时代,数字媒介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互动性特征,从而为视觉符号修辞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数字媒介场域中,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传播样态、表现形式以及意义内涵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也给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提出了新的课题。

数字媒介时代重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的生成、传播与接受逻辑,驱动其从传统媒介时代的单向宣导型向数字媒介时代的双向互动型范式进行系统性转换。这种范式转换的核心问题在于:视觉符号不再是意义单一、静态的“宣传画”,而是演变为由技术驱动、算法推荐、数据生成、用户共创和沉浸体验等共同塑造的丰富多元的意义网络。这种范式转换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生产主体的转换:从个人独白到多元共创

传统媒介时代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生产主体主要是权威的政府机构、媒体组织或文化精英,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生产呈现出较明显的中心化、专业化特征。这样的视觉符号修辞文本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过在数字媒介时代的文化多元场域中,也可能会因为与公众日常审美和表达方式存在偏差,而导致情感疏离。

在数字媒介时代,去中心化的社交平台和算法推荐机制,使来自民间的、个性化的视觉符号内容也有机会获得巨大流量,人机协同、算法推荐、用户二

次创作等生产形式使得视觉符号修辞文本呈现出分布式编码与意义协商的特征。为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传播效能,应积极吸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意义生产,让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表达更接地气、更具生命力。例如,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央视春晚播出后,气势恢弘、意蕴深厚的视觉文化盛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与评论,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分享民族团结互助和民族交往交融的感人故事。从个人独白到多元共创的生产主体转换,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进入了一个全员参与、全程互动、全息表达的新阶段。

(二) 生产方式的转换:从封闭生产到动态生成

传统媒介时代,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生产流程遵循“调研—策划—制作—发布”的线性顺序,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制作,生产周期较长,而且符号意义被预先设定,受众只是被动地进行观看。这种静态的产品形态难以适应数字媒介生态的即时性、交互性、迭代性要求,符号本身思想和审美价值容易固化,与多元丰富的公众情感脱节。

在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生产方式,从封闭式、静态化、一次成型的生产模式,转向开放式、动态化、持续生成的创新模式。这种范式转换既是技术迭代的结果,更是适应数字媒介时代传播规律、深度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数字媒介时代社会节奏加快,应当对受众的认知思维和审美特征进行及时了解和把握,基于用户接触、使用、停留、情感反馈的数据,实时优化文本的视觉符号元素,实现敏捷迭代、动态生成的精准修辞。例如,国潮游戏《原神》《黑神话·悟空》等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符号融入游戏场景,在游戏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受众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意识。从封闭生产到动态生成的生产方式转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符号修辞在数字媒介时代的一场深度变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觉符号意义内涵深度融入参与者的数字实践与情感体验,在视觉符号动态生成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三) 接受体验的转换:从被动观看到具身交互

传统媒介时代的视觉符号修辞文本面向所有的受众,追求覆盖面与到达率,受众处在被动的观看状态。而数字媒介技术将各种不同形态文化符号的聚合,实现了视觉符号修辞的跨媒介叙事和多模态话语的生产,能够充分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模态

符号的综合,让静态的文化符号“活起来”,生成一种沉浸式的传播景观,极大地调动了受众的参与性,从而实现受众主体意识与文化符号内涵的深度融合。例如,由敦煌研究院、人民日报新媒体和腾讯联合推出的数字化平台“云游敦煌”小程序,通过数字化技术为用户提供敦煌石窟艺术体验,用户可以在虚拟场景中全方位探索敦煌石窟,在欣赏精美艺术的同时还能参与制作壁画图案并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实现从“传统参观”到“数字拥有”的体验升级。

四、数字媒介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符号修辞建构策略

数字媒介时代的视觉符号修辞需要通过创新性的文化符号形态实现精准化传播。基于上述范式转化特征,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策略的核心应当超越单向的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以跨媒介叙事策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生产的多元共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动态生成”;通过构建沉浸式、共情化的视觉符号修辞文本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身交互”。

(一) 以跨媒介叙事建构多模态文化符号场域

跨媒介叙事是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视觉符号修辞策略,“跨媒介叙事是为创造完整的叙事体验,分散的通过多种传播渠道进行故事创作的过程”^[16]。跨媒介叙事具有典型的数字叙事特征,“数字叙事,被理解为使用数字工具和多媒体形式创造、表达、解释和分享故事、文学艺术作品、个人经验等的实践或方法”^[17]。跨媒介叙事打破了传统媒介时代单向输出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与传统的叙事相比,跨媒介叙事的形态与效果不仅取决于内容素材,还与生产、传播与展示内容素材的数字媒介系统之间密不可分。换言之,跨媒介叙事因为数字技术才得以存在,因而数字技术对于叙事内容的表达、传播与体验具有重要影响。

一方面,跨媒介叙事打破了传统叙事依靠单一符号形态的表达方式,可以通过多模态符号的组合激发受众的视听感受。另一方面,跨媒介叙事强调媒介内容生产层面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动性,受众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表达方式共同参与媒介内容的再生产。例如,河南卫视推出的大型传统文化沉浸展《唐宫夜宴》借助VR、AR等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焕

发出了独特的国潮美学,受众在数字媒介技术构建的多模态文化符号场域中不仅能够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魅力,而且还可以通过亲身参与的方式实现文化符号意义内涵的补充、延展和扩容。《唐宫夜宴》播出以后,网民们通过打卡、制作表情包、二次创作等方式使得这一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意义内涵变得更为丰富。跨媒介叙事生成的多模态符号意象激活了文化符号潜在的意义内涵,激发了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

(二)以传统文化符号现代转译实现形式创新与价值融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还需要借助数字媒介技术搭建不同层面和形态文化符号聚合的平台,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现代转译与融合。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存在传统与现代的时空张力,如今,数字媒介技术“通过重构传统文化与当代语境的关联逻辑,成为贯通文化基因赓续与现代价值转换的关键媒介”^[18]。数字媒介通过技术融合打破了不同形态文化符号之间的意义边界,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成为一个开放多元的意义空间,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意义内涵的现代转译。《唐宫夜宴》中代表传统文化的建筑、服饰、仪态、舞姿、道具等图像符号,体现的是一种端庄典雅的审美特质。此外,节目中还融入了许多当代文化符号元素,例如音乐、声效、光影、动作等,也把中国古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簪花仕女图》中的许多视觉符号元素融合进来,让各种不同文化符号聚合在同一个文本中,从而实现了不同形态文化符号意义内涵的交互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蕴含着丰富的精神价值,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现代转译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译,核心是通过技术赋能、语义重构和场景适配,将承载民族精神价值的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符合当代审美价值的表达形式。其本质是通过文化基因的解码、重构与再编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觉符号修辞文本的“动态生成”,实现传统符号与现代价值的关联。例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将数字技术与传统美学深度融合,三星堆青铜器、马王堆帛画、《千里江山图》等传统文化符号通过数字化处理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风格,中华文化符号内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被编码到故事世界的视觉文本中,在文化符号转译、解码、再现、重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中

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隐喻,有助于激发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符号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共鸣。

(三)以沉浸式和共情化叙事激发情感共鸣

数字媒介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觉符号修辞还需要突出沉浸式和共情化特征,即通过数字媒介技术构建感官沉浸式的场景化叙事空间,打破时空距离,让受众置身其中,以具象化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情感内核引发受众的心理共情和价值认同。以内容分享和价值共创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信息传播模式已经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催生了新的文化样态和意义体系。以短视频为例,“不同于‘播出即结束’的传统视听媒介,在短视频平台中,‘被看见’只是传播的开始,因为所有被人们看见、分享和传播的内容,都有可能被再次截取和拼贴,一帧画面是最小的单元,人们主动参与意义的建构”^[19]。在短视频空间中,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在场被虚拟在场取代,社会现实中分散的个体被短视频纳入到同一个媒介场域中,形成了虚实交融的代入感和沉浸感。

短视频的传播特征决定了其时间长度和信息容量有限,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和内容中快速抓住受众注意力的举措就是通过符号化的聚焦、场景化的营造、沉浸式的展演以及共情化的叙事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例如,2024年端午节期间,抖音发起了“粽子星人请举手”活动,邀请网络达人和用户拍摄制作与粽子、端午相关的视频,许多网友通过短视频的形式分享了各地有特色的端午习俗和包粽子活动。在短视频构筑的媒介仪式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端午、粽子所隐喻的是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这种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以中华文化符号作为载体,强化了受众的情感共振,增强了互动仪式的参与感和情感联结。短视频视觉符号修辞机制能够将处于不同地域和时空中的个体联结在一起,搭建多层次、场景化的互动体系和意义共享机制,形成个体符号叙事、多维情感交织和集体记忆共鸣的情感共同体。

结 语

在图像化时代,数字媒介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文字符号的表意逻辑,注重视觉体验的图像符号成为当代社会文化主要的表意形式。“当代社会由于人们的视觉经验活动频次的增加,图像符号成为表达、理解和解释事物的主因,视觉文化被标示为区别于

其他文化的视觉感官体验,视觉符号有一种天然的传播优势,通过对抽象符号的再表达,图像符号逼真再现客观事物,降低客观事物的理解难度。”[20]通过视觉符号修辞能够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转化为具象化的图像,在运用视觉符号修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既需要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应当注重将数字媒介技术的创新性、互动性等特征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符号修辞实践,从而以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根基。

参考文献

[1]刘涛.何为视觉修辞:图像议题研究的视觉修辞学范式[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6):1-11.

[2]汪金汉.视觉修辞视野下语图关系的哲学谱系与问题域研究[J].新闻界,2019(9):82-89.

[3]张媛.观念的图像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觉修辞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161-168.

[4]万忆,曾洁.影像修辞与认同叙事:纪实影像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基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纪录片《共同的符号》的研究[J].民族学刊,2025(6):10-19.

[5]漆飞.权力的可视性:视觉政治与图像生产[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9(2):326-34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李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9:80.

[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8]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6.

[9]彭兰.媒介化时空重塑的日常生活[J].新闻与写作,2022(6):刊首语.

[1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217.

[11]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142.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13]布斯.修辞的复兴[M].穆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86.

[14]CHARLES A H. The psychology of rhetorical images[M].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36.

[15]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30(1).

[16]唐昊.媒介融合时代的跨媒介叙事生态[J].中国出版,2014(12):28-31.

[17]付雅明,张永娟,刘炜,等.数字叙事作为数字人文方法:现状与可能[J].图书情报工作,2022(14):10-19.

[18]杨艺,梁钦.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叙事的价值、样态与策略[J].学术探索,2025(5):70-76.

[19]王晓红,魏韬.短视频平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媒介逻辑[J].中国编辑,2024(2):11-15.

[20]王立慧.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叙述中的意识形态研究[J].符号与传媒,2019(2):164-174.

The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al Mechanism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eng Yueji

Abstract: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 holds that images, as an independent symbolic system, can construct the meaning framework of modern society. In the era of visualization,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meaning production and expression in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metonymy, synecdoche, and metaphor mechanisms of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 the abstract concep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transformed into concrete and perceptible images or video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the meaning-making mechanism of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as demonstrated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ubject co-creation, dynamic generation, and embodied interaction. Cross-media narrative strategies realize the reproduction of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al text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diversified expression methods. The modern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helps generate innovative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al texts and meaning-making mechanism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mmersive and empathetic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al strategie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collective memory,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China toward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mages; visual symbolic rhetoric; meaning; digital media

责任编辑: 苇 如